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何 天 齐

党的建设是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三个主要法宝之一。党的组织“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①要在中国这样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里,建设一个广大群众性的、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建党思想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建党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建立了完整的科学体系。因此,研究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必要对毛泽东建党思想进行历史的考察和研究。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欧洲先进国家无产阶级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在创建和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初期)等国际性的无产阶级组织的过程中创立的。他们在《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等文献中,论述了无产阶级联合和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策略、组织原则、国际主义、党的团结和党内斗争等基本原埋,奠定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理论基础。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总结俄国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理论,创立了建设思想政治组织上高度一致、集中统一的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学说。他所写的《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策略基础和理论基础。十月革命以后,列宁领导建立了第三国际,具体帮助和指导了许多国家建立新型革命政党的工作。1920年他写了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1923年写了《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著作,总结了十月革命以后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基本经验,为执政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具体帮助下,按照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特别是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所以,毛泽东建党思想在基本上同马列主义关于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是完全一致的,是马列主义党的学说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特殊的国际国内条件,经过艰难曲折的道路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建党

* 此文是本刊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而刊发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一组文章的最后一篇。

思想，又具有自己的特点，它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无产阶级人数很少，但是革命性和战斗力很强，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它必须联合和依靠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同时又要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保持对于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另外，由于国内没有民主制度和经济政治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是长期的武装斗争，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些社会历史条件和特点，决定了中国党的建设，除了具有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和特殊的困难。例如：要在长期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和个体农民的汪洋大海中、在党内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占相当大比重的条件下，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这是没有先例的极端艰巨的任务；党的建设同党与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同武装斗争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也是别的国家少有的。除了这些特殊的国内条件以外，从国际条件来说，中国党是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我党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进行活动和斗争的。因此，我们党的建设，党的挫折与发展、胜利与失败，都是同共产国际的指导分不开的。所以，正确处理同共产国际和俄国（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也是我党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毛泽东建党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国内国际条件下，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正确处理，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党的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二

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同毛泽东思想一样，经历了四个时期：一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萌芽时期，即从党的筹建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二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初步形成和发展时期，即从井冈山斗争到抗日战争的前夕；三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成熟和它的理论体系完备的时期，即抗日战争的整个阶段，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四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继续发展时期，即从解放战争时期到建国后的若干年代。

在毛泽东建党思想的萌芽时期，我们党基本上是向俄共学习，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来建设自己。早在1918年，李大钊就接受和开始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准备建立党的组织，其中毛泽东和蔡和森在建党前夕的一系列通信中比较详细地讨论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和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路线以及组织纪律等问题。②建党前后对改良主义、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三次论战，保证了我党一开始就能够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来进行建设。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指出：要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达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目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提出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最彻底的革命纲领。以后，从党的“二大”到“四大”，对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统一战线的策略、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等问题，都进行了讨论和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标志着我们党已开始注意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革命问题。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代表了当时党内的最高水平。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通过调查研究，比较准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

本思想，指出了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主张大胆放手地领导农民运动，热情支持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这就在实际上解决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对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重大贡献，是毛泽东建党思想萌芽的重要表现。但是，总的来讲，我们党这个时期还处在幼年时代，无论对马列主义理论的了解和研究，特别是对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统一的了解，党的实践经验，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都是不足的，也没有形成自己坚强的领导核心。特别是党的“二大”决定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样，党的主要活动基本上听命于共产国际。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限制，这个时期虽然有了毛泽东建党思想的萌芽，但是还没有党的建设问题的专门论著，还不可能形成比较完整的毛泽东建党思想。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遭到极大的摧残，以毛泽东为正确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逐步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开始寻找并且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形成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同时也开始形成了毛泽东建党思想，这集中表现在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中。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整个决议的核心。这个决议是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遵照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党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亲自进行调查研究的，总结了两年多红军建设和红军中党的建设的实践经验，集中大家的智慧写成的。这个决议，把党的建设提到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的高度，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党内军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单纯军事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作斗争，并且分析了这些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指出了它们的危害，提出了纠正的办法。同时，在组织上，决议坚持了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既反对不适当地限制民主，也反对不适当地限制集中，强调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增强党的观念，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使党成为一个具有严格的无产阶级纪律的民主集中制的党。总之，这个决议的中心思想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党员、教育部队，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把红军建设成为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的武装。古田会议决议把三湾改编和井冈山斗争以来逐步形成的建党建军思想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使之更加系统化理论化，确立了建党建军的整套理论与原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

古田会议以后，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光辉著作，第一次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和“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阐述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个伟大的真理，号召“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这篇著作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形，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标志。这篇著作，把古田会议决议提出的反对主观主义、提倡“实际情况的调查”等重要思想推进了一大步，为党的建设和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这个时期，虽然毛泽东等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对党的建设的规律也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还没有被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机关所接受，加上共产国际某些不正确的指挥，因而仍然使革命遭致多次挫折，特别是统治党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路线给革命和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直到1935年一月的遵义会议，才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在当时最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上纠正了王明的左倾错误，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新的领导，从而使党和革命转危为安。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毛泽东

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从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方面清算了王明的左倾错误，也从思想认识上揭露了犯错误的根源。他说：“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③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党还不可能在全党范围内从思想理论上彻底清算过去的历次错误、特别是王明的错误，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达到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高度一致。

三

历史证明，在中国的条件下，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关键问题，是要在党内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从而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制定和执行，保证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团结和统一。早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几乎同时提出了改造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过：“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④古田会议决议的核心内容就是要“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虽然这个决议在各部分红军中都先后不等地实行了，但从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机关来说，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逐步为全党所接受，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以及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又一次统一战线的建立等等，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创造了主客观条件。所以，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建党思想趋于成熟并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和时局》、《论联合政府》，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以及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就是这个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展开了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各个方面，并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过程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建党原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政治指挥部，因此党的纲领和政治路线是否正确，决定着党的性质和革命事业的成败，也决定着党本身的状况。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政治路线主要的就是处理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和革命武装斗争问题。“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同样，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时，那末，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也就会要后退一步。”^⑤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以后得出的重要经验，可以说是党的建设的一个规律，它为以后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第二、党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路线的制定和执行，必须以正确的思想路线为基础，要纠正错误的政治路线，也必须首先从端正思想路线着手。因此，着重党的思想建设，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这是中国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原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这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各国共

产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样才能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党由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认识不足，因而多次遭致严重的挫折和失败。在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毛泽东在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定理论基础的重要哲学著作《实践论》中就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这就从根本上揭露了我党历史上一次右倾和三次左倾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为从思想上清算和纠正这些错误指明了方向。以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把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统一具体化为一个公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且用中国语言“实事求是”来加以通俗地表述。所谓党的思想建设，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在全党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党在政治上正确和组织上巩固的根本基础和保证。延安整风运动主要地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由于中国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它同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是党内最主要和最本质的矛盾。我党历史上各次重大错误，可以说大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表演。因此，党的思想建设，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民主革命时期最主要的就是要改造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⑥就是说要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党员应加强自己的思想意识修养和党性锻炼的问题，对党的思想建设作出了贡献。

第三、党不仅首先要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要在组织上进行建设。“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⑦党的组织建设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我们党一开始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大部分时间里也是基本上执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但是当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民主集中制原则也遭到破坏。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对民主集中制原则有了进一步认识和发展。首先，提出了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规律的论断，“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的集中制”。^⑧这是对民主集中制做出的新的阐释，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一个理论贡献。其次，进一步论述了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即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坚决反对割裂二者或把两者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实现党内高度民主和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同时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党的纪律，以维护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保证党在政治上和行动上的一致，既反对在党内提倡盲目服从，搞奴隶主义，又反对破坏纪律和服从纪律讲条件的错误倾向。此外，我们党还把民主集中制同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联系起来，创造了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党内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党的组织建设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干部问题。抗日时期，我党对于干部问题的重要性、选拔干部的标准、处理各部分干部的关系，以及如何识别、考察干部，使用、培养干部等问题，都有了比较系统深刻的认识，并制定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正确的干部政策。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刘少奇的《论党》、陈云的《论干部政策》和《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等，就是这方面的主要著作。

第四、提出了党风这个概念，指出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⑨毛泽

东1942年作的延安整风运动的动员报告就叫做《整顿党的作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学风、党风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他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⑩把作风问题提到世界观和思想方法的高度来认识和解决，这是我党建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五、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党内斗争，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⑪“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⑫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只能采取讲道理的办法。我党历史上几次右倾和左倾错误，表现在党内生活和党内斗争问题上，主要都是搞家长统治和惩办主义，而尤其是王明搞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害最烈。采取这种方针，不但不能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纠正错误，而且会窒息党内民主，破坏党的团结统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就是针对历史上的这种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而提出来的。贯彻这个方针，既要反对机械过火的斗争，也要反对自由主义，而是坚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正确而恰当的批评与斗争，分清是非，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新的团结。由于斯大林在这方面的错误，影响到各国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是学的“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⑬所以，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实际上就是对斯大林错误方针的一种抵制和纠正。我党用这种方法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并克服它们的历史经验，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贡献，不能不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发生深远的影响。

第六、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我党虽然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提出了“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任务，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还不可能找到一种从全党解决这个问题形式。在抗日战争时期才找到了这种形式，这就是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的任务，是批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彻底清算王明的教条主义，提高全党的思想政治觉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方法是先学习和研究一些文件，在学习文件、掌握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每个人都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错误，发扬优点和成绩。这次整风是我国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运动。五四运动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打开了道路，在思想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而开辟了我国民主革命的新阶段——新民主主义阶段；延安整风则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识并掌握了此种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从而达到了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高度一致，保证了抗日战争和整个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延安整风的基本经验就是从思想教育入手，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端正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毛泽东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⑭而整风就是开展大规模的党内思想教育的最好形式。以后我党多次采用这种整风形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第七、提出了党在一切工作中都必须为了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毛泽东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

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又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⑤他还把群众路线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结合起来，创造了一整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以实现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正确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刘少奇在《论党》中对党的群众路线作了系统阐述，指出：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因此，“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他还详细阐述了作为群众路线的基础和灵魂的群众观点所包含的四项内容，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所有这些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抗日战争中为全党所熟悉和运用，大大地加强了党同群众的联系，提高了领导水平，使党立于不败之地。

此外，关于党的领导作用、关于党性、关于党员标准和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等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都有很好的经验和论述。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组成部分和发展。

四

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全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决战，在紧张而激烈的斗争中，全党于1947年冬开展过一次以整顿农村基层组织为重点的整党运动，以后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央作出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毛泽东起草的这个决定，总结了党内实行集体领导的经验，批评和纠正了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等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同时指出了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所有这些，对于改善党的领导、健全领导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保证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建国前夕，鉴于我党即将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多次、特别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并作出了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的规定。所有这些，对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继续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起了重要作用，也为执政党的建设指出了方向。

建国以后，毛泽东建党思想继续发展，特别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系统地提出和论述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的的问题，提出了在执政的条件下进一步加强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不那么突出、因而没有着重加以解决的问题。遗憾的是，这些重大问题在后来的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中，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和“左”的错误，毛泽东建党学说遭到严重的歪曲，党的建设受到严重的损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展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围绕这个中心任务，强调全党要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的一致，反对一切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正确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纠正各种以权谋私和官僚主义的歪风，使党继续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加强组织性

纪律性，保证全党行动的一致。此外，还提出了“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纠正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错误作法，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原则，等等。所有这些，都为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指出了明确的要求和方向，是在新的条件下对毛泽东建党学说的继承和重大发展。为了实现这些基本要求，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我党正在开展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为内容的全面整党。回顾毛泽东建党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我们深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全面整党一定会取得伟大胜利，毛泽东建党学说一定会得到更大的丰富和发展。

注释：

①③⑦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

② 参见《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毛泽东和蔡和森1920年8、9月至1921年1月的通信。

③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④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⑥ 参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⑧⑫ 刘少奇：《论党》。

⑨⑭⑮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⑩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

⑪ 刘少奇：《论党内斗争》。

⑬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应该保留一点“鱼”味

——古籍整理札记之一

用繁体字整理古籍，有利于保持古籍的原意，对于研究工作者是非常必要的，但不利于迅速普及古代科学文化知识。我们认为，在大量用繁体字整理古籍的同时，适当地用简化字整理、注译一些典籍，也是很有必要的。近年来，许多古籍整理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些版本将一些不该简化的字简化了，导致以字害义损及全篇。比如《换鱼字》这则笑话就有这个问题。

李章邻家小集，主人素吝，既进饌，主前一鱼特大于众客者。章从旁见之，即请于主曰：“每见人写蘇字，其鱼字或在左，或在右，何也？”主曰：“古人作字不拘一体，从便移易耳。”章即引手取主前鱼示众曰：“从主命，今日左边之鱼，亦合从便移过右边。”一座为之喷饭。

整则笑话自始至终围绕着“蘇”字中的“鱼”字托出李章的机智，勾勒主人的吝啬。而有些集子却把“蘇”字简化成“苏”字。这一简，就失去了“鱼”味。因为“苏”字无“鱼”，李章问：“每见人写苏字，其鱼字或在左，或在右，何也？”这一问，就使人觉得莫明其妙了。主人说：“古人作字不拘一体，从便移易耳。”而“苏”字无“鱼”，又何“从便移易”呢？如果在这里保留这个繁体的“蘇”字，意思不是很明白了吗！

又如：“其人指佛前一树簾子云：‘此以作剔灯棒，可世世用不尽。’”竹簾的“簾”和布幕、酒旗的“帘”，在古汉语里是两个意义不同的字，而在简化字里统归于“帘”，如用“帘”取代于“簾”，可能会闹出用软绵绵的酒旗、布幕做剔灯棒的笑话。如果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与其简化，倒不如用繁体字为好。（辛谷）